



# 武王伐纣研究

苏德荣 著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## 序 一

彭 林

我国的史学传统极为悠久，至迟在商代，就已经有了直录史事和建立典册文档的习惯。周代的《尚书》，是官方文诰的汇编，相传原本有百篇之多，文繁事富，记载了许多珍贵的史料。到了春秋时代，国别史开始繁荣，鲁有《春秋》、晋有《乘》、楚有《梼杌》、《国语》所记，为西周末年至春秋之间周、鲁、齐、晋、郑、楚、吴、越等国史事，号称“八国春秋”。墨子生时，曾见到过《百国春秋》（事见《隋书·李德林传》李德林答魏收书所引《墨子》）。到了战国，列国的史乘更为纷繁。西晋太康年间出土的《竹书纪年》，就是魏国的史书。云梦秦简所见，也有秦国的史记。《战国策》一书，相传为战国时期各国史官或策士所辑，涉及东周、西周以及秦、齐、楚、赵、魏、韩、燕、宋、卫、中山等十二国史事。西汉出现的第一部纵贯古今的通史著作《史记》，则是中国史学的重要里程碑。

司马迁生活在一个空前统一的时代，他所要记述的已经远远不是一国、一地或一姓、一系的历史，而是在东渐于海、西极流沙、北跨幽燕、南越五岭的范围内，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、上下三千年的文明史。司马迁著《史记》，是为了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，是要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。为此，要“网罗放失天下旧闻，王迹所兴，原始察终，见盛观衰”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，为了要对不同地域、不同时期中发生的事件进行排列、归纳、比较，探求社会演变的轨迹，就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年代学的标尺。历史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编写的，年代是历史学的骨架，没有准确、明晰的年代系统，历史学就无法真正挺立起来。但是，经过秦火之后，作为全国年代体系轴

心的周王室的纪年已经残缺，只能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，即公元前841年，前面的十位周王，只有穆王、厉王有纪年，其余均付阙如，因而无法系连。司马迁试图用列国的“谱牒”来弥补王室世系的断缺，但是这些谱牒彼此歧异，莫衷一是，而且不能与王室纪年对应。以“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”为宗旨的司马迁只得将年代断在共和元年。以此为界，前后分别对待：将夏商周三代的王室世系编为《三代世表》，表中虽有列王的世系，但没有在位年数，即所谓“有王无年”；从共和元年起，开始有了可靠而再不间断的王室纪年，而且可以横向与各诸侯国对应，所以称为《十二诸侯年表》。

古史年代问题上的这一缺憾，造成了我国“五千年文明，三千年历史”的不正常现象。从西汉的刘歆起，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试图解决这一“歌德巴赫猜想”式的难题。最理想的突破点，是武王克商之年。这一年是商、周两朝的分界，如果能取得这个年代学上的关键之点，则不仅可以向下安排西周列王的年代，而且可以上推商年、夏年。武王克商之年的问题非常复杂，比如，《史记·周本纪》说，十一年十二月周师渡孟津，兴伐纣之役。那么，这“十一年”是文王十一年，还是武王十一年？学者纷争千年，至今未能了结。这又引出一个问题，即文王是否受命称王？这也是学者间相为攻伐的焦点之一。此外，文献中提到武王克商的前两年，曾有一次“孟津观兵”的军事行动，具体的时间，《周本纪》说在九年，《书序》说在十一年；更有学者认为，所谓“孟津观兵”实际上是子虚乌有之事。凡此种种，孰是孰非？另外，西汉时发现的《泰誓》，所载伐纣之事与其它文献多有抵牾，此篇是否真为《尚书》逸篇？等等。这些争议相互纠缠，极形复杂。它们既是先秦史研究和经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，又都是聚讼不决的著名疑案。

本书的作者苏德荣先生，原本是河南新乡市一位文物工作者，后因工作需要，调入该市牧野公园。牧野公园的所在地，相传是武王伐纣时牧野之战的古战场。为了给公园撰写关于牧野之战的陈

列说明，他开始搜集、整理和研究牧野之战的史料。在此过程中，他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。强烈的学术进取心和工作责任心驱使他急流勇进，在充分吸收历代学者的既有成果的基础上，开始了艰巨而深入的研究。他以惊人的毅力和数年之功写成了这部著作，在有关武王克商之年的问题上，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，这在近些年的先秦史研究中也是不多见的，实在令人钦敬。

承作者不弃，于今年初下寄稿本，使我有幸成为此书的第一位读者。我因参加国家“九五”重大科研项目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，并承担“文献中夏商西周编年的研究”课题中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，因而尤为关注苏先生的大作。三读之后读，深感这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。作者不迷信成说，不依傍名家，唯求其是。尽管我们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，但我依然从中获得了许多教益，相信读者朋友一定会有同感。书中涉及的问题是历史上形成的，因此，问题的最终解决也还需要时间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苏先生的工作为将来破译古史年代学的“歌德巴赫猜想”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

欣闻苏先生的大作已获得新乡市有关部门的出版资助，即将付梓，殊觉欣喜。蒙苏先生抬爱，索序于我，出于对苏先生学术的钦佩，勉从命，是为序。

1999年8月5日于北京清华园

## 序 二

### 赵 顷 霖

新乡市位于河南省北部，北依太行，南临黄河，地理环境十分优越，工农业生产基础良好，卫河蜿蜒流过市区，土地肥沃，人民富庶。早在新石器时期，就有较为密集的人群在这里繁衍生活，仰韶文化、龙山文化遗址密布市区。在商代，这里为黄河的北曲之地，处在商都朝歌的近郊之外、远郊之内。由于良好的地理环境条件，商代统治者在这里设置大牧区，专供商都朝歌祭祀和食用用牲。在这大牧区里，有严格的管理机构，有大量的管理人员和从事畜牧的劳动群众。由于有众多从事畜牧者长期劳动、生活在这里，自然形成了许多村落，这些村落，又当然以“牧”名之，故在商代称这里为“牧邑”。又由于这一牧区很大，故又称“牧野”，《诗·大明》“牧野洋洋”就是说这牧区之大的。

商代末期，由于商纣王的荒淫残暴，天怒人怨，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中叶，周武王率叛商的诸侯国兴兵伐纣，与纣王决战于牧野。在这次大战中，太公姜尚亲率勇士挑战，如飞扬的苍鹰击纣军；周武王亦亲率戎车向纣军之阵猛烈冲击，经过激烈的大恶战，冲垮了纣军的阵线，一举克纣灭商，建立了西周政权。

自牧野大战之后，牧野，便成了新乡的专称。周武王牧野克纣灭商的事迹作为新乡历史上的重大事件，在群众中代代流传，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，即牧竖樵夫也能讲上几个周武王、姜太公的故事和传说。为纪念他们的功绩，后人还在武王盟诸侯处，现在的获嘉县同盟山修建武王庙；在牧野决战前姜太公曾经驻扎过的新乡市郊区畅岗村建太公庙；在牧野大战的原址，现在新乡市郊区牧村建

兴国寺及立“牧野凭吊处”古碑等。新乡历代的地方官员和士大夫，也无不把牧野大战作为地方史志的重要内容去研究探讨。

本世纪八十年代，新乡市政府决定，在牧野古战场遗址上修建牧野公园。该公园位于原清水北岸，牧野战场遗址的南端。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和意愿，将把该公园建成一个以牧野大战为背景的有文化特色的公园。现在第一期基建工程已经完成，关于牧野大战的景塑区、景塑点正在建设之中，俟公园建成后，牧野大战的壮烈场面将重现于世人面前。

苏德荣同志原在潞王墓搞考古及明史研究，治学严谨，多有建树，成果累累，曾多次应邀出席国际学术会议，一向以刻苦勤奋著称于国内外学术界和省内文博界。为配合牧野公园的建设，新乡市政府于1994年把该同志调至园林部门，搞牧野大战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。经过德荣同志三年多的辛勤努力，搜集有关资料百余万字，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，就有关武王伐纣、牧野大战的一系列问题逐次进行研究。

德荣同志在研究过程中，不囿于传统旧说，以客观、科学的态度，以澄清史实为重点，实事求是，就有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说，廓清了许多自汉代以来的作为信史流传的谣传和谬误，如西周兴周灭商战略思想产生的时代、灭商战略的实施过程、文王的改元称王、武王孟津观兵、《泰誓》三誓的时间、牧野大战等许多重大问题都提出了与传统旧说完全不同的新观点。尤其是他对《尚书·周书》部分《西伯勘黎》、《泰誓》、《牧誓》、《武成》诸篇的研究，更是以惊人的胆略和翔实的论据，提出了许多与传统旧说相悖的新说。自古以来，《尚书》号称难读，自汉至今，为之训诂、注疏者均为历代名儒，德荣同志不畏艰难，不迷信，不盲从，不为汉代以来的今古文门户所左右，坚持实事求是，其精神值得敬佩，其学风值得提倡。

两年前，武王伐纣作为重大课题，列入国家科研计划，这一重

大科研课题的重点，是解决武王伐纣之年，即西周开国的纪年问题，这一问题，是夏、商、周断代工程的重点。而德荣同志的这本著作，其重点是旨在解决武王伐纣的有关史实问题，这无疑是对解决西周纪年问题的大贡献。因此，此书的出版，不但为牧野公园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史实依据，也是对先秦史学界、对夏、商、周断代工程的重大贡献，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
1999年8月

## 自序

新乡，是牧野古战场的所在地。武王在牧野大战中，克纣灭商，建立了西周政权。自此之后，关于牧野大战的史事和传说在群众中广为流传，新乡的很多村落因牧野大战而得名，历代的地方官员和文化人，无不把牧野大战作为地方史志的重要内容去研究探讨。牧野大战，一直作为我市历史上的一大盛事为群众所乐道，历久不衰；牧野，成了新乡的代名词。

我原是一个文物工作者，自八十年代初，长期在潞王墓文物管理所搞明史，主要是搞潞王及明代分封制度研究。1994年，被调至园林部门，市政府及园林绿化处领导根据建设牧野公园的需要，安排我搞牧野大战资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。通过三年多的埋头钩集，少则摘录，多则复印，搜集有关资料近百万字，边搜集，边进行梳理、研究。随着占有资料的不断丰富和研究的不断深入，使我越来越感到震惊，武王伐纣及商末周初史事史实问题上的许多重大问题，从汉代至今的两千多年来，大都是以讹传为信史。我认为，解决史实问题，要比解决纪年问题重要得多；而只有认真解决有关的重大事件的史实问题，才是解决纪年问题的关键。换言之，纪年问题应在澄清史实的基础上解决。不然，解决纪年问题就是空谈，即使硬性定之也没有多大意义。因此，本书的重点是针对有关武王伐纣基本史实的澄清。此外，《尚书》的《西伯戡黎》、《泰誓》、《牧誓》、《武成》诸篇是关于武王伐纣问题的重要资料，由于汉代今、古文之争的影响，孔传本《古文尚书》又被元明清重立今文门户的今文派攻击、否定为伪《书》，更增加了武王伐纣研究的复杂性，故本书不得不以一定篇幅辩论《孔传》本古文及《泰誓》的真伪。由于学识浅薄，研究的各种条件很差，信息闭塞，我深知没有资格参与这些重大问

题的讨论,但由于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责任心的驱使和本职工作之急需,不揣浅陋,以实事求是的态度,对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与传统旧说相悖的新看法,试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;并藉此向先秦史学界大声疾呼,以期引起专家们的重视,以期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目的。

我搞武王伐纣、牧野大战的研究,是新乡市政府、市园林绿化处安排布置的,这一工作,始终是在我市各级领导的关心、支持下进行的。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,受到赵顷霖副市长的热情鼓励,在本书脱稿之后,赵副市长又两次亲自批示,关心支持此书的出版,并为本书写了序言;新乡市建委王亚州主任、魏尚志副主任大力支持,拨给专项经费,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;新乡市化纤厂党委副书记崔天祥、新乡市公用事业局副局长李双安、牧野公园主任牟修儒给予指导,给我时间,保证了此书的完成;在我研究武王伐纣问题之初,受到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嘉弘先生的热情鼓励,他对《武王伐纣不存在孟津观兵之事》一文给予了高度评价,对我深入研究和撰写此书增加了不少的信心和勇气;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刘海文副教授,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新斌副研究员,均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支持;书中所用资料,除我和儿子东鹏的藏书中有部分基础资料之外,大部分采集于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,郭培贵教授和徐志煌同志对我搜集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,书中所用的绝大部分资料来自该资料室,没有二位先生的支持,这本小书就没有问世的可能。尤其是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孙景峰副编审,从我研究这一课题开始,始终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,对每个细节都费心尽力。在本书草稿初成之时,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彭林教授,在百忙之中对书稿进行了细致的审定,对本书的体例、内容等问题提出了宝贵意见。在本书出版之时,又为本书赐写了序言。但因出版前修订时时仓促,有些地方(如“伪古文”及新今文派诸问题)未能按照彭先生的意见一一改定。故本书存在的疵瑕

和错误之处，即未按彭先生意见改定所致。对于各位领导和师友的关心、支持、帮助，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！

本书除个别篇目外，大部分是在 1997 年 9 月至 1998 年元月完成初稿，1998 年上半年陆续改定、誊清的。在这期间，正值母亲重病在床，多亏哥嫂日夜悉心守护侍奉，尽量给我时间，但部分书稿仍是在母亲的病榻旁改定的。因此，时间仓促，加之学识水平有限，所述所论，舛误之处一定不少，敬请专家指正。

苏德荣

1999 年 8 月 16 日

## 目 录

序一.....	彭 林(1)
序二.....	赵顷霖(4)
自 序.....	(7)
一 武王伐纣不存在孟津观兵之事.....	(1)
二 论西周灭商战略思想产生的时代及其实施灭商战略的 三大阶段 .....	(10)
三 文王“称王”考述 .....	(25)
四 论《楚辞·天问》所载有关武王伐纣的几个问题 .....	(44)
五 论牧野大战的战场地望 .....	(54)
六 牧野大血战 .....	(61)
七 牧野详解 .....	(72)
八 《西伯戡黎》研究 .....	(80)
九 《泰誓》研究之一:《泰誓》正说.....	(90)
十 《泰誓》研究之二:汉《泰誓》述论 .....	(103)
十一 《泰誓》研究之三:《泰誓》后得 .....	(129)
十二 《泰誓》研究之四:关于孔壁古文《泰誓》 .....	(135)
十三 《泰誓》研究之五:孔传本《泰誓》述论 .....	(146)
十四 《泰誓》研究之六:《泰誓》书时述论 .....	(188)
十五 《牧誓》研究.....	(204)
十六 《武成》研究.....	(213)
十七 关于武王伐纣行军路线问题的讨论.....	(224)
十八 武王伐纣的有关时间问题.....	(236)
十九 孔传本《古文尚书》真伪辨正.....	(248)

# 一 武王伐纣不存在孟津观兵之事

武王伐纣“观兵”于孟津说，自两汉以来，一直作为信史流传至今。检阅两汉以及先秦的有关资料，这一说法值得怀疑。这一问题，直接影响武王伐纣、《尚书·泰誓》等重大问题的研究。作为西周开国的重大事件，很有必要加以澄清。

## 一 “观兵”说的提出及其影响

先秦以来的有关史料表明，第一次提出此说的是司马迁，即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：“九年，武王上祭于毕。东观兵，至于孟津。……乃还师归。”

司马迁在这一自然段里，在提出“观兵”于盟（孟）津说的同时，还同时提出了“八百诸侯不期而会”之说。上述二说，同时还见于《尚书大传》，遂被后世沿用，成为信史。

郑玄注《乐记》云：“武王除丧，至孟津之上，纣未可伐，还归。二年，乃遂伐之。”

《后汉书·郑兴传》云：“八百诸侯不谋同会，皆曰：‘纣可伐矣。’武王以未知天命，还兵待时。”

《后汉书·公孙述传》云：“昔武王伐纣，先观兵孟津，八百诸侯不谋同辞，然犹还师以待天命。”

《诗·閟宫疏》、《太平御览》卷一八一、《文选注》等对此均有引用。

尤其是唐孔颖达《尚书·泰誓》的《正义》和《疏》，大量引用并加以发挥，影响更大。历宋、元、明、清，学术界对此说均无任何异议。

议。如清孙星衍说：“史公为‘东观兵’者，说其至孟津之意。”<sup>①</sup>及至现代的史家，全用此说，无一例外，且给予了更多的解释：郭沫若说：“周武王继位的第二年，在盟（孟）津大会诸侯，检阅军队，作了伐商的演习。”<sup>②</sup>

翦伯赞说：“武王即位后二年，‘东观兵，至于孟津。’这一次进军，只不过是一种大规模的侦察或试探而已。”<sup>③</sup>

白寿彝说：“武王‘东观兵，至于孟津’，观兵是试探性的示威，并不是准备与殷商直接开战。”<sup>④</sup>

赵矢元、冯兴盛主编的《新编中国通史纲要》说：“周武王在孟津大会诸侯，……为灭商作了组织和舆论上的准备。”

浙江高等师范学校《中国通史讲义》协作编写组编写的《中国通史讲义》说：“武王九年，周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，检阅军队，进行伐商演习。”

总之，观兵于孟津说是作为信史流传至今的。

## 二 观兵说可疑

（一）观兵说不见于先秦典籍。先秦典籍对于《大誓》多有引用，明确称引者计有：《孟子》滕文公下、万章上各一次；《左传》成公二年、襄公三十一年、昭公元年、昭公二十四年各一次；《墨子》非命中两次、非命上、下、兼爱中、下、天志中各一次；《周语下》一次；《郑语》一次；《坊记》一次；《荀子·议兵》一次。凡十九次。

此外，西汉史籍除《史记》和《尚书大传》之外，引用《太誓》或涉及武王伐纣之事者，有《春秋繁露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吕览》、《白虎通》等凡十四次。

以上先秦及西汉史籍凡三十三次叙及武王伐纣之事，但均无“观兵”还师之说。但西汉已有“不期而会孟津上八百诸侯”之说（《汉书·娄敬传》）及白鱼赤鸟二瑞之说（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、《终军传》）。此二说不见于先秦典籍，说明西汉时期的《书》之《传》、

《说》比之先秦有所增多。

(二)“观兵”说法的混乱。观兵于孟津说自司马迁提出之后，后世在沿用、解释此说时说法十分混乱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周本纪》谓“未知天命”，而在《齐世家》则谓“观诸侯集否”；《尚书·泰誓》之《正义》更有多种说法：如“退以示弱”、“卜诸侯之心”、“言于商知”、“观政于商”等。《后汉书·公孙述传》谓“还师以待天命”；《太平御览》、《越绝书》则谓“仁人在位”、“仁人未去”；孙星衍谓“夷、齐之谏”，并解释说：“武王知天命未可伐，不独为三仁之存，必因夷、齐之谏也。圣人以人心知天命。义士非之，故知未可伐也。”<sup>⑤</sup>

直至现代，则又有郭沫若“检阅军队，作了伐商的演习”、翦伯赞“大规模的侦察和试探”、白寿彝“试探性的示威”等等说法，不一而足。

“观兵”还师的理由虽然如此众多，但稍加分析，并无一说可以令人据信。如“未知天命”、“还兵待时”、“仁人未去”等，出师前就不知天命未可？仁人尚在？需待时？即卜诸侯之心和观诸侯集否，亦应在兴师前对诸侯的拥护程度心中有数，非大规模兴师才能“卜”和“观”吗？如果八百诸侯不期而会于孟津，就应当乘势灭殷，使八百诸侯均落得个“不知天命”而各自回师，是示诸侯以不信，于理不通！“言于商知”、“观政于商”、“示弱”云云，更为无稽之谈，到底是示威还是示弱？如果是这样的观政和言于商知，岂不令商高度重视而加强防御和战备，而增加灭商的难度？如因夷、齐之谏，难道两年之后夷、齐便同意武王“以臣弑君”了吗？灭殷后尚不食周粟，如听其谏，武王当终事殷而守臣份，而无甲子牧野之事。

(三)从《史记·周本纪》观兵自然段的内容看，亦自相矛盾。从祭毕、奉文王木主以伐的声势，告诸节毕立赏罚以定其功的决心，“遂兴师”的定语，是正始兴师伐殷无疑。结尾以未知天命而还师是讲不通的。《楚辞·天问》“武发杀殷何所悒？载尸集战何所急？”；《淮南子》“武王伐纣，载尸而行”，<sup>⑥</sup>是载尸集战，载尸伐纣，不是观

兵、示弱，更不是检阅军队，搞军事演习。

(四)“观兵”说成为信史之后，历代治《书》者即把《泰誓》上篇定为“观兵时事”。从《周本纪》观兵自然段的内容看，不应为《泰誓》上篇。什么是誓？是宣战书、是檄文！马融所疑“‘八百诸侯，不召自来，不期同时，不谋同辞’，及‘火复于上，至于王屋，流为鵠，五至，以谷俱来’。举火神怪，得无在子所不言中乎？”<sup>⑦</sup>所疑甚是。《周本纪》观兵段白鱼赤鸟之事，至多是《泰誓》的传说。

(五)在时间问题上，《史记》有明显大错。《周本纪》说“十一年十二月”师渡孟津，而《齐世家》又说“十一年正月甲子，誓于牧野。”孙星衍说：“史公以此二月为十一年二月甲子。”<sup>⑧</sup>但十一年十二月才师渡孟津，该年的二月怎能灭纣？陈梦家为司马迁圆说，谓司马迁《太誓》用夏正，《牧誓》用周正，对《齐世家》之“十一年正月甲子”，陈氏谓“疑当为十二年正月甲子，乃是殷正。”<sup>⑨</sup>且不说所谓的殷正、周正是否存在，即使存在，也只是建首不同而已，怎能有一年之差？且司马迁大史家，在叙述武王伐纣的时事上怎能夏、殷、周正混用？孙星衍解释“十一年十二月”谓“殷十二月为周正月”，这样，正月渡津，二月牧野克纣，似较合理，但是，司马迁主虞、芮质成文王称王，改正朔，布王号，其《周本纪》之九年、十一年，《齐世家》之十一年，均理应为文王称王之年数，即均用周正。按孙氏之解，“十一年”应为十年才对，月虽对了，但年又错了，司马迁怎能年用周正，月用殷正？

### 三 孔传本《泰誓》经、序应予尊重

孔传本《古文尚书》自宋代被疑，至清阎若璩等定案为伪之后，研究古史及《尚书》者达成一个共识，即重《史记》而轻《古文尚书》。尊《史记》为“五经总汇。”<sup>⑩</sup>为“五经之橐龠，群史之领袖”，为“五经门户。”<sup>⑪</sup>如同文物断代一样，《史记》成为研究《尚书》的标准器，凡《史记》之所载，即被认为是真经；凡《史记》之不载，或与《史记》异

者，就大有嫌疑。其实这是很不恰当的。研究武王伐纣史事，《史记》仅可作为参考，《古文尚书》有关篇目，尤其是《泰誓》的经、序应是值得重视的重要资料。这是因为：

(一)《史记》曾被严重窜乱。崔适说：“《汉书》已云其缺，于是续者纷起，见于本书者曰褚先生，见于《七略》者曰冯商，见于《后汉书·班彪传注》及《史通》者，有刘歆等十六人。”<sup>⑫</sup>被“去头削足甚夥。”<sup>⑬</sup>“各本误改、误析、误倒、误窜，纷乱如丝，几不可读。”<sup>⑭</sup>

(二)《史记》所引用《尚书》者，有节引、有意译，有以训诂引经，参杂以传说和个人意见，故不但多与经文、经意不合，还出现许多错误。近人蒋善国说：“《史记》多用训诂引经，并有时节引经文。我们不能完全据《史记》所载《尚书》，来考定《尚书》经文真相。”<sup>⑮</sup>蒋氏在详论了《史记》以训诂代经字、意译、引说经文而非原经文、节引经文并有明显错误、或失经文原意者之后，总结说：“综看《史记》所节引的，固属简要可贵，但多失经文原来面貌。”<sup>⑯</sup>

《汉书·儒林传赞》说：“初《书》唯有欧阳。……至孝宣世，复立大小夏侯《尚书》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迄孝宣世，有欧阳、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。”是武帝末之前只有欧阳一家立学。可知武帝之时通经者还甚少。司马迁是从宏观上治史的大师，但不一定是经师。而东汉以后各代的不少学者，以《汉书·儒林传》所载司马迁曾从孔安国问故为由，说司马迁通古文经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说：“《史记》于《五帝本纪》载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文，于《夏本纪》载《禹贡》、《皋陶谟》、《益稷》、《甘誓》文，于《鲁周公世家》载《金縢》、《无逸》、《费誓》文，于《燕召公世家》载《君奭》文，于《宋微子世家》载《微子》、《洪范》文。凡此皆从安国问故而传之者，乃孔壁之真古文也。”朱氏之说代表了这一观点的学者们的意見。但是，崔适《史记探源》卷一《古文尚书》节说：太史公生年不及武帝末，即使武帝末鲁共王真有得书事，孔安国献之，“迁亦何由从之问故耶？”证明从孔安国问故之事为子虚乌有。

(三)孔传本《古文尚书》可信。仍以近现代治《尚书》的陈梦家、蒋善国二位先生为例。陈氏和蒋氏均是尊重今文，相信古文为伪的。但陈梦家说：“孔传本保存了古文学家的百篇《书序》，正如它保存了今文二十九篇经文一样，虽有改易，究属是少数的、局部的。古文学家的百篇《书序》又保存了今文学家的二十九篇《书序》，虽有差异，也是少数的、局部的。”“孔传本《书序》不但略同于马、郑《古文尚书序》，其二十九篇今文之序和汉世三家今文之序，亦是大略相同的。东汉熹平石经，其《尚书》部分有二十九篇经文残石和《书序》残石，足资考订。”“据石经经文，知《尚书》部分每行通为七十三字，试以孔传本的二十九篇《书序》填入，其字数大致相适合。”陈氏在排比了 70 篇《书序》后得出如下结论：“上述 70 篇《书序》，自刘歆以次学者称引，皆同于孔传本。……另外，马、郑对这些序皆有注文，凡此说明，东汉时代，无论今文学家的班固、王充、杨彪，或是古文学家的刘歆、许慎、郑玄等所引述的《书序》，皆与孔传本大致相同。至于司马迁，虽不少同于今文学说，但亦有近于古文学说的。”<sup>⑯</sup>陈氏在指出孔传本《尚书》可信的同时，亦指出了司马迁既非今文学家，亦非古文学家。蒋善国亦承认：“经是愈古愈存真相，传是愈晚愈显精审。要想看两汉的尚书经文，惟赖伪《孔传》；要想看隋、唐以前的《尚书》传注，也只有伪《孔传》”。<sup>⑰</sup>清代陈澧亦说：伪《孔传》“若不伪称孔安国，而自为书，如郑笺《易》、《毛》，则诚善矣。”<sup>⑱</sup>

凡此都说明，孔传本《尚书》是可以信赖的，而孔传本《尚书·泰誓》的序和经文，并无丝毫“观兵”回师的意味，故而应予重视。

在清代，自孔传《古文尚书》被定案为伪之后，为经师们所鄙视。至现代，研究古史及治《尚书》者一方面因认定其伪而轻视，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和利用其史料价值，在目前的先秦史及《尚书》的研究中，就是在这极为矛盾的情况下进行的，严重困扰着先秦史及《尚书》的研究。尤其是《尚书·泰誓》，更被定为伪中之伪，完全是孔传的作者伪造的。其实，魏晋之时，汉、魏石经俱在，各种《尚